

王鶴齋 同治己丑 28 — 1930 年 陽州 省墨 亮明少懷沈

时间：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九时三分至十一时五十五分

地点：国务院小礼堂

周总理、李富春付总理接见工交系统21部、委革办造反派一百七十九人，领导干部一百二十七人，共三百零六人，一个占百分之六十，一个占百分之四十。

周总理讲话

交通口的种富春、先恩、秋里、谷牧已接见过了。

上次接见是什么时候？〔众：一月二十六、二十七日，最后一次是二月一日〕现在已经两个月了。

今天听我的吧！条子不看了（因有人递条子）。

我讲一意见和大家一起讨论。上面讲的是夺权斗争，进入全面阶级斗争，进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阶段，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阶段快三个月了，紧张的三个月了，紧张工作两个月了。夺了权以后，对各级领导排个队。那时才有大联合、三结合的思想，以后就发展了，斗争在中央各部门发展也不平衡，不管怎么样，从上海夺权以来快三个月来，北京五十多天了。在国务院各口还没有一个成熟典型经验可以介绍，还在摸索。我们已夺权十七年了，由最高领导由下而上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，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，这次夺权斗争是一九四九年夺权的继续，这次为最彻底。一九四九年是军队打天下，由上而下军管，除国民党上层多数跑走外，其它全

王鶴寿同志回忆1928年——1930年

滿洲党团省委的情况

(按：王鶴寿同志1928年——1930年在滿洲省委先后任团省委組織部长，团省委书记，南滿行动委员会書記以及撫順特支書記等职务。現任中央冶金工业部部长，中共中央候补委員。)下面是王鶴寿同志回忆的情况：

我是1928年冬和唐宏經一起从莫斯科到滿洲省委的。我去前滿洲省委的情况我不清楚。我到滿洲省委时，省委的主要負責人有陈为人、吳力石、唐宏經。当时唐宏經可能是省委书记。組織部长是吳力石。团省委书记是张任光（张福生），以后是饒漱石。另外还有个姓陶的（东北人）和一个姓孙的（此人現还在，具体下落不詳）也作团的工作。我到滿洲省委后也作团的工作。当时我除参加团省委工作外，主要在沈阳兵工厂作团的工作，当时兵工厂有党团支部，党支部負責人是个性张的。周总理参加六大后，从莫斯科回国途中路过沈阳时，曾到兵工厂支部开过会，給該厂工人讲过話。

我到滿洲省委不久，把兵工厂的党团工作搞起来之后，省委认为撫順很重要，因为那里工人很多。于是党团省委决定派我到撫順組織党团特支。我到撫順后搞了个党的特支，並作特支書記，有个姓苏的作团的工作。我到撫順不久，因回沈阳参加省委扩大会议被扑，以后撫順的情况我就知道了。

省委扩大会议是于1928年12月間在沈阳大东門外牛世玉（黨員）的家里召开的。参加会议的人員有陈为人、吳力石、唐宏經、张福生和我等党团負責入共20多人。另外还有几个兵工厂工人和大連一个工人也参加了会议。正在开会期間被敌破坏，結果使参加会议的人員，除张任光跑掉外，其他人員全部被扑。

我們被扑后，有关滿洲省委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。当时我們在獄中只和外边的互济会有联系。1929年7月我們才出獄。这时刘少奇同志到滿洲省委去了，並作滿洲省書記。省委其他成員还有：李自芬、刘若云、丁君羊、廖如愿、林仲丹（张浩）。团省委书记是饒漱石。我出獄后仍参加团的工作，任团省委組織部长。这个时期党团的主要工作是作群众工作。当时正是中东路事件，我們提出“保卫苏联”，“拥护苏联”的口号。在工人当中进行經濟斗争的宣傳；在学校的学生中进行馬列主义的宣傳，向学生宣傳进步思想，介紹进步书籍。当时奉天紗厂、东北大学工厂，鉄路工厂等搞的較好。二中学校也比較好，該校有个教員姓孙（可能叫孙秀峰），他是个党员。

1930年立三路綫到了滿洲省委，这时省委負責人是李自芬。立三路綫在东北貫徹，不是沒有爭論，党内我不大清楚，可能也有爭論。团省委里是有爭論的。团省委在討論立三路綫提出的在东北要搞：(1)总政治同盟罢工；(2)組織革命兵变；(3)組織地方武装暴动等三个口号时，我曾提出意見。我認为在东北这样作是不行的。当时我提出主要应作群众工作，搞經濟斗争。我提出意見后，不但沒有被采納，反而給我戴了一个“关外特殊論”“东北特殊論”的帽子。当时饒漱石把情况向党省委作了报告，党省委批評了我，后来撤消了我的工作，由鄒大鵬同志接替我的工作。

1930年4月，党組織被破坏，林仲丹同志由哈尔滨回沈阳組織滿洲省委，我和林仲丹一起由哈来沈。林仲丹任滿洲省書記，我担任团省委书记。这时仍是立三路綫时期。以后又将滿洲省委改組为滿洲总行动委员会，負責人仍是张浩。同时，在南滿、北滿、东滿也成立了行动委员会。我担任南滿行动委员会書記。南滿行委

的工作中心主要在农村，当时我在清原、盘石一带依靠朝鲜农民組織武装暴动。在农村杀了一些朝鲜狗腿子和坏人。东满行委的情况也是这样。北满行委的情况我不清楚。立三路線鬧的挺兇，实际群众运动並不大。象总政治同盟罢工，組織兵变，搞武装暴动等等，都沒有搞起来。

党中央三中全会，基本上糾正了立三路線。在东北取消了滿洲总行动委员会，又恢复了滿洲省委的工作。在1930年十一、二月間，中央派陈潭秋同志来东北任滿洲省委书记。这时南满、北满、东满等行委也改成地委。这时我又回到沈阳，仍作团的工作。为了紀念广暴，党省委派陈潭秋同志，团省委派我去哈尔滨布置紀念广暴工作。我們到哈后，因哈尔滨組織被破坏，陈潭秋、孟用潜和我等都被扑了。直到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我們才出獄，出獄后我就离开了东北，以后的情况我就知道了。

三中全会糾正了立三路線后，于1930年12月間王明等为了反对三中全会，又召开了一个四中全会，在四中全会上出現了罗章龙右派。以唐宏經为首的在东北也組織了右派。因这时我被扑在獄中，詳細情况我不知道。

我在滿洲省委工作期間，省委主要工作抓沈阳、哈尔滨和延边。大連、撫順也作一些工作。那时主要是作学生工作。当时沈阳兵工厂、鉄路工厂，紡紗厂、东北大学工厂、迫击砲厂等都有党的支部或个别党员。哈尔滨有特委吉林、长春、大連也有党的組織。当时党团的主要工作是作群众工作。在学校中团的工作多一些。那时农村工作很少作，只是在朝鲜人居住的农村中有一些联系，但当时朝鲜人中派別很多，所以也未开展起来。在中国人居住的农村中，据我知道沒有开展工作。当时規模大的斗争有中东路事件的斗争，这

是刘少奇同志亲自在那领导的。还有个法国李，叫李梅五也在那。

撫順1927年的情况我不知道，我是1928年去的撫順。我去撫順的目的，主要是因为当时撫順工人比較多，所以党团省委共同决定派我去撫順发展党团组织工作，組織党团特支。我作党的特支书记，有个姓苏的作团的工作。还有胡杰三当时也在撫順工作。那时撫順有多少党团员我記不得了，我記得外团組織有工会。我被扑后，何人去撫順接任我的工作，我已記不清了。

訪同人：

朱永閣

任万国

1960年10月19日上午

王鶴壽同志回忆录

我是1928年冬和唐宏經一起从莫斯科到滿洲省委的。我去前滿洲省委的情况我不清楚。我到滿洲省委时，省委的主要負責人有陈为人、吳丽石、唐宏經。組織部长是吳丽石。团省委书记是张任光（张福坐），以后是饒漱石。另外还有个姓陶的（东北人）和一个姓孙的（具体下落不詳）也作团的工作。我到滿洲省委后也作团的工作。当时我除参加团省委工作外，主要在沈阳兵工厂作团的工作，那时兵工厂有党团支部，党支部負責人是个性张的。周总理参加六大后，从莫斯科回国途中路过沈阳时，曾到兵工厂支部开过会，給該厂工人讲过話。

我到滿洲省委不久，把兵工厂的党团工作搞起来之后，省委认为撫順很重要，因为那里工人很多。于是党团省委决定派我到撫順組織党团特支。我到撫順后搞了个党的特支，並作特支書記，有个姓苏的作团的工作。我到撫順不久，因回沈阳参加省委扩大会议被扑，以后撫順的情况我就知道了。

省委扩大会议是于1928年12月間在沈阳大东門外牛世玉（黨員）的家里召开的。参加会议的人員有陈为人、吳丽石、唐宏經、张福坐和我等党团負責共20多人。另外还有几个兵工厂工人和大連一个工人也参加了会议。正在开会期間被敌破坏，結果使参加会议的人員，除张任光跑掉外，其他人員全部被扑。

我們被扑后，有关滿洲省委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。当时我們在獄中只和外边的互济会有联系。1929年7月我們才出獄。这时刘少奇同志到滿洲省委去了，並作滿洲省書記。省委其他成員还有：李自芬、刘若云、丁君羊、廖如愿、林仲丹（张浩）。团省書記是饒漱石。我出獄后仍参加团的工作，任团省委組織部長。这个时期党团的主要工作是作群众工作。当时正是中东路事件，我們提出“保卫苏联”，“拥护苏联”的口号。在工人当中进行經濟斗争的宣傳；在学校的学生中进行馬列主义的宣傳，向学生宣傳进步思想，介紹进步书籍。当时奉天紗厂、东北大学工厂，铁路工厂等搞的較好。二中学校也比較好，該校有个教員姓孙（可能叫孙秀峰），他是个黨員。

1930年立三路綫到了滿洲省委，这时省委負責人是李自芬。立三路綫在东北貫徹，不是沒有爭論，党内我不大清楚，可能也有爭論。团省委里是有爭論的。团省委在討論立三路綫提出的在东北要搞：(1)总政治同盟罢工；(2)組織革命兵变；(3)組織地方武装暴动等三个口号时，我曾提出意見。我認为在东北这样作是不行的。当时我提出主要应作群众工作，搞經濟斗争。我提出意見后，不但沒有被采納，反而給我戴了一个“关外特殊論”“东北特殊論”的帽子。当时饒漱石把情况向党省委作了报告，党省委批評了我，后来撤消了我的工作，由鄒大鵬同志接替我的工作。

1930年4月，党組織被破坏，林仲丹同志由哈尔滨回沈阳組織滿洲省委，我和林仲丹一起由哈来沈。林仲丹任滿洲省書記，我担任团省書記。这时仍是立三路綫时期。以后又将滿洲省委改組为滿洲总行动委员会，負責人仍是张浩。同时，在南滿、北滿、东滿也成立了行动委员会。我担任南滿行动委员会書記。南滿行委

的工作中心主要在农村，当时我在清原、盘石一带依靠朝鲜农民组织武装暴动。在农村杀了一些朝鲜狗腿子和坏人。东满行委的情况也是这样。北满行委的情况我不清楚。立三路线闹的挺兇，实际群众运动并不大。象总政治同盟罢工，组织兵变，搞武装暴动等等，都没有搞起来。

党中央三中全会，基本上纠正了立三路线。在东北取消了满洲总行动委员会，又恢复了满洲省委的工作。在1930年十一、二月间，中央派陈潭秋同志来东北任满洲省委书记。这时南满、北满、东满等行委也改成地委。这时我又回到沈阳，仍作团的工作。为了纪念广暴，党省委派陈潭秋同志，团省委派我去哈尔滨布置纪念广暴工作。我们到哈后，因哈尔滨组织被破坏，陈潭秋、孟用潜和我等都被扑了。直到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我们才出狱，出狱后我就离开了东北，以后的情况我就知道了。

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后，于1930年12月间王明等为了反对三中全会，又召开了一个四中全会，在四中全会上出现了罗章龙右派。以唐宏经为首的在东北也组织了右派。因这时我被扑在狱中，详细情况我不知道。

我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，省委主要工作抓沈阳、哈尔滨和延边。大连、抚顺也作一些工作。那时主要是作学生工作。当时沈阳兵工厂、铁路工厂，紡紗厂、东北大学工厂、迫击炮厂等都有党的支部或个别党员。哈尔滨有特委吉林、长春、大连也有党的组织。当时党团的主要工作是作群众工作。在学校中团的工作多一些。那时农村工作很少作，只是在朝鲜人居住的农村中有一些联系，但当时朝鲜人中派别很多，所以也未开展起来。在中国人居住的农村中，据我知道没有开展工作。当时规模大的斗争有中东路事件的斗争，这

是刘少奇同志亲自在那领导的。还有个法国李，叫李海五也在那。

撫順1927年的情况我不知道，我是1928年去的撫順。我去撫順的目的，主要是因为当时撫順工人比較多，所以党团省委共同决定派我去撫順发展党团组织工作，组织党团特支。我作党的特支书记，有个姓苏的作团的工作。还有胡杰三当时也在撫順工作。那时撫順有多少党团员我記不得了，我記得外团組織有工会。我被扑后，何人去撫順接任我的工作，我已記不清了。

訪同人：

朱永閣

任万国

1960年10月19日上午

訪問唐韻超記錄整理

1960年6月19日

(按：唐韻超又名唐宏經。該人1925年在大連鐵道工厂工作时参加中国共产党，1928年任滿洲省委常委並担任职工运动工作，1931年因参加罗章龙派进行反党活动，被开除党籍。現在本溪市农场歪头山站前磚瓦厂做管理工作。)

一、大連工学会的建立及其活动情况

早在1923年大連成立了工学会，最初有500人左右，車輛厂200多人，有25名會員。負責人我和付景阳、楊志云等人。这个組織实际就是工会組織，因为当时提出成立工会怕敌人不許可，所以把它叫作工学会，也就是工人文化学习会，这样敌人才允許紗厂和小野田洋灰厂都有分会。成立工会的目的，是互相帮助，开办夜校。为了提高工人文化，增加知識，工会研究决定成立夜校，分高級班和初級班，由我負責。大連工学会主要从鉄路为主。当时为了使工人积极参加工会組織，必須根据工人切身利益着想。在1925年春在大連鐵道工厂开展一次斗争，当时提出四个条件：(1)增加工資；(2)鉄路工人坐火车免票；(3)要求住宅，应給房費补助；(4)工人有病，厂方应負責治疗。經過几次协商，四个条件解决了三条，唯增加工資一条沒有解决。厂方答复三个条件后，工会組織在工人当中的威信更高了，工人们說：“工会是給工人办好事的。”所以当时几乎全厂工人都参加了工会，这时已經发展到七千多名會員。

大連机械工厂也有工会組織，1925年冬由于資本家开除工会干部，工人罢工半天。

1924年大連船渠工厂有工会組織，当时有一个工人牺牲了，工厂給买的棺材，並开了追悼会，这主要是工会的力量，对工人的教

育也很大。

秦茂 他是1923年以后去的大連，当时住在大連工学会，並担任夜校教員工作。他走后邓和高去的。

尹一，作团的工作（現在中央交通部工作）。

张治負責宣傳和組織工作。

付景阳，1924年曾去河南参加全总代表大会。

1925年春天邓中夏同志到大連去巡視工会工作。他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工作。

北方局的王和波也到过大连，后来他和李大釗一同牺牲的。

馬輝之，1924或1925年去过大連，他那时也在全国总工会工作。

1926年4月，大連紡紗厂工会刚成立不久，工人进行了自发的罢工。后来总工会研究决定支持这次罢工，当时提出四个条件：(1)增加工資；(2)改善伙食；(3)反对打罵工人；第四条忘記了。当时資方不答应这四个条件，罢工繼續坚持下去，坚持到两周时，把工会干部逮捕，不久又把他們放回来了，資方企图讓他們下令复工，但並沒有复工，又因招工不成，就对工人进行威胁，結果鬧了一次冲突，又把工会干部捕去，这时群众就举行游行示威。警察到总工会騙干部去警察署，干部去后全被扣压起来，接着敌人施行大逮捕。以維持治安名义共捕去二十四、五个人。工会干部全部被捕。敌人虽然实行大逮捕，但罢工一直坚持下去。这次罢工共坚持了两个多月，最后終於胜利。被捕的人，每人罰金七八十元，于1927年的2月和5月先后两次出獄。

二、大連黨組織的情况

1924年李振英（李大汉）由上海来到大連，李到大連不久即成立了党的組織。当时叫支部还是市委不清楚。負責人除李振英外，还有

邓洁、楊志云、楊可能負責組織工作。当时大連黨組織归北方局領導。

1925年左右，李与关向应同志离开了大連这时大連市委的負責人是楊志云。楊当时在大連文化青年会中当干事，青年会是于1921年大連泰东日报編輯付立魚（国民党）办的。

大連黨組織发展的很快，1926~~1927年間，大連的黨員估計有400~~500人，所有的工厂都建立了支部。

1927年6月末或7月初，大連黨組織发生了大破坏，这时我正在鄉下的家里。有一天我正在我伯父的甜瓜地里，敌人到我家里去抓我，当时我父母告訴他們，說我去金县，結果他們沒有抓到我。第二天敌人又去我家，这时我已躲起来了，后来下傳单，把我父亲和我的哥哥都傳去了。后来我就有离开家鄉去沈阳。

大連黨組織1927年六七月間被破坏后，1928年曲文秀到大連任市委書記。曲被捕后，1930年张洛书到大連負責党的工作。张被捕后又派去王群，后又被破坏。被捕这些人均被判处十年。王群直到1945年解放后才出獄。

大連黨組織領導的群众团体有：(1)印刷联合会；(2)店員联合会。

三、我在滿洲省委及哈市委工作时的情况

1927年我由金县的家鄉来到沈阳，在东北大学工厂当了两个多月的临时工，以后去吉林，1928年春，我又回到东北大学工厂工作。这时东北大学工厂沒有黨組織，只有个别黨員。有一天王立功（大連鐵道工厂工人，黨員）去找我，叫我到滿洲省委工作。1928年3月末我到了滿洲省委。当时省委有陈为人（当时都叫他老韓，因为他爱人叫韓慧之），吳丽石、张任光 and 老廖。这些人的分工是：陈为人是省委書記兼宣傳，秘书长是老廖，吳立石作組織，张任光作青年团工作，我担任职工运动工作。当时省委机关有三处，一处是在皇寺大街××里，

是省委秘书处，老廖住在那里。另一处在现在沈阳艺术宫西边路南第二个胡同里，我和吴丽石住在这里。这两个机关的房子现在仍然存在。还有一个机关设在小北关，后来我和吴丽石都搬到那里去住。这个机关的房子现在不存在了。当时省委书记住的地方我不知道。

我到满洲省委工作一个多月，决定叫我去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。和我一同去的有张任光、王傳壁（当时大连车辆厂的，已死）于智勋（现在大连甘井子住）朱秀春（当时是团员，但也参加大会）等人。六大以后又把我留下参加共产国际六大。其他人均先回国，1928年底我回到满洲省委，不久周总理由苏联回国路过满洲时，到满洲省委向省常委传达了六大精神。

1928年12月，满洲省委为传达六大精神和周总理对常委所作国际国内形势的精神，省委在大东边门外牛世玉（原大连党员在奉天以看病先生为掩护职业）的家里召开了扩大会议。因会前缺乏周密布置，正在会议进行当中，敌人以检查户口的名义把参加扩大会议的人全部捕去。共捕去20多人。有省委负责人陈为人、吴丽石、张任光、王鶴寿（当时作团的工作，刚来不久），张德祿（省委交通）、牛世玉和我；兵工厂支部党员刘国棟，团员王化民；东北大学工厂潘任德（党员）；王贊生（又名王贊龙，大连来的，现在大连公安部門工作）；中学教员李正权；另外还有李振起（是托派）等。张任光在被捕当时跑掉了，其他全被送到大连边門里警察署（厅？）押起来。以后把我和潘任德，王贊生送到宪兵队，把刘国棟送回兵工厂，剩下的全部送到警察厅。一个月以后，又把我们送到軍法处押在南門里监狱。我們在獄中共住了七个月，因敌人沒有得到証据，結果找保釋放。敌人所以沒有得到証据，是因为在敌人到会场捕人时，吴丽石把开会文件扔到牛世玉家小孩的尿桶里 並很巧妙的向別人說：“怎么不把尿桶拿出去，放在屋里怪燥的。”于是別人就把尿桶拿出去了，敌人为什么文件

也沒有得到。另外，被捕人到獄后，口供串通了，大家一致說搞互濟會。我們出獄后被分配到各地去工作，所以互相沒有見面。

我出獄后不久，于1929年的8月間，省委的負責人孟用潛找我，在現在沈陽市中山廣場交際處附近的地方接的頭，他安排我到上海去學習。我學習還沒有結業，滿洲暴發了中東路事件，我又回滿洲，和我同時回來的有王立功（當時他也在上海學習），另外還由上海帶回來一個小馬（可能是楊靖宇）。

1929年10月間我由上海回到滿洲省委。這時省委書記是丁君羊。孟堅已去哈爾濱。丁和我們接的頭，（接頭地點是奉天紡紗廠前面他的家里）然後把我介紹到哈爾濱。這時哈爾濱市委書記孟堅，組織張洛書，另外還有一個朝鮮人，陶敏搞文書，李振起參加市委。

劉少奇同志于1930年1、2月間到哈爾濱，據說他是當時的滿洲省委書記。

1930年春天（五一以前）林仲丹（張潔）任滿洲省委書記。並到哈搞一次“五一”紀念，這時正是立三路線時期。

林仲丹離開滿洲省委后，1930年秋趙毅敏任省委書記，大權任秘書長。

1930年6、7月間孟堅回哈傳達中央會議精神，這時成立了滿洲總行動委員會省、市同時成立，省市行委書記就是原來的省市黨委書記。這時我在哈仍搞工運，當時哈爾濱電車工人有一個支部。

1930年9月間，我在哈市街上碰到李立三同志（他可能是去蘇聯路過哈爾濱），他問我哈爾濱工作怎麼樣？我把哈爾濱工作向他報告一下。

1930年10月，滿洲省委召開反立三路線的擴大會，我由哈爾濱去省委參加大會，會后把我留在省委。這時省委書記趙毅敏，還

有一个四川(?)人。我到省委不久，哈尔滨組織又被破坏，市委书记孟坚和中央巡視員陈譚秋(又名吳覺民)、王鶴寿(团省委工作)等人被捕。这时我又到哈接排工作。到哈后滿洲省委又給我打电报，叫我回省委去上海参加四中全会。四中全会是王明召开的，这次会议实际是立三路綫的繼續。

四中全会后，我回哈尔滨反四中全会。和我一起由上海回来的还有徐文雅，他到沈阳。到哈不久我就被捕，在獄中見到陈譚秋和孟坚。直到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熙洽作吉林省长，实行大赦，把我們都放出来了。出獄后我在街上迁到楊一辰，他告訴我，叫我写反省书，我說写什么？他說認識到那里就写到那里，写好后我去拿。”我写好后楊一直没有去拿。以后我就由哈回到沈阳，找到我弟弟，到工厂作一个时期，以后又作一个时期教員。这时和組織就断了联系。

三中全会后，取消总行动委员会，成立省委。

滿洲省委是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由沈阳迁往哈尔滨的。当时我在獄中。迁哈的原因是因为哈尔滨工作基础好，日本占領的晚。

